

促进社会的成熟

周卡特 (Joe Carter)

一 社会的成熟

心理学家侯赛因·丹尼什 (Husayn Danesh) 博士把迈向成熟的转变, 描述为从专制型和放纵型转向更成熟的“整合型”社会关系的一个运动过程。

虽然专制型的关系曾经并仍然是人际关系中最常见的, 不过还有放纵型和整合型两种。……人类成熟时代的莅临, 必定与整合型的生活、人际关系的优势相契合。专制型和放纵型展示出童年和青春期发育阶段的特征, 而整合型则描绘了一个成熟类型的人际关系, 因而, 它对于我们理解推动人类由青春期向成年期过渡所需的先决条件来说尤为重要。¹

他把这些关系模式演绎为**人格类型**(见下表)。我们也可以把这些类型看作是范围更大的社会状态。

人格类型	特征	世界观	情感与理智特性	与他人的关系
专制型	以权力为导向	二元分立的感知	刻板僵化	屈从于专制
放纵型	以享乐为导向	不加分辨的感知	混乱	无法无天的关系
整合性	以成长为导向	存多样, 求团结	有创造性	负责与合作

图1 人格类型

如果我们用上表考察中国, 可以说中国正在向整合状态成长。中国围绕君权天授的观念组织起来的等级森严、中央集权的社会体制有很长的历史。中国展示出了克制和中庸, 对“个人意志从属于社会意志”这一原则的尊重, 以及服从的传统。儒家思想强调整体福祉的重要性。比如, 它提倡当个人与社会或家庭发生冲突时, 个人应放弃自己的利益, 舍身取义。西方往往不把这种克制和中庸、注重群体理解为尊重整体团结或是尊重领导制度, 而只是从服从专制“政权”的角度来解释。

更成熟的整合式的世界观是“存多样、求团结”。现在, 这一新的世界观已是所有社会的共同目标。如果我们将彼此视为社会有机体的细胞, 如果我们认同个人受益于社会整体, 那么, 理所当然, 个人行为要是能加强整体也必定会加强个人。没有这个基本理念, 就不会有动力参与到集体的命运中, 或是服务他人; 合作互惠的原则亦难以实行。

虽然人类社会并非由一堆不同的细胞、而是由赋有智力和意志的个人组合而成, 但是人体生理运作的特色却阐明了生存的基本原则。其中首要的是“多样并存, 大同团结”。正是构成人体组织的整体性和复杂性, 以及身体各细胞完美地整合于其间, 使得每个组成部分得以全面发挥各自的专门潜能。任何一个细胞, 不论是对身体的功能作出贡献或是因整体的健康而受益, 皆不可脱离身体之外而单独存活。²

¹ H.B. Danesh, M.D., Unity: the Creative Foundation of Peace, Bahá'í Studies Publications, Canada, 1986.

² 巴哈伊国际社团:《人类的繁荣》, 收录于《谁在书写我们的未来——巴哈伊全球愿景》, 澳门: 新纪元国际出版社, 2009, 第31页。

个人意志从属于社会意志的同时，修身，正像儒家模式所阐述的，仍然是发展的出发点。

当个人意志从属于社会意志，其个性并不会在群体中消失，而是在发展中更被关注，从而在前进的潮流中发现自身的位置……这种关系对于文明生活的保持极其重要，它要求社会个人之间极尽理解与合作；因为需要培养一种风尚以便社会个体成员的所有的潜力得到发展，这种关系必须允许“个性”有“自由空间”，通过自发、主动和多样的形式来确保社会的生命力，从而“维护个性”。³

在一个成熟的社会环境中，公民权意味着个人的行为同时满足两个目的：分享和表达我们独立的、个人的能力和智慧；确保整个社会的活力。尽力创造出后者，才能更好地开发前者。中国要进行这一过渡，也许比西方社会从较为“放纵”的状态转向成熟更为容易。

（一）个人的成熟

中国文化重视个人品质，视之为基本的发展目标。

宋儒朱熹（1130~1200）认为合乎天理的统治应注重“全民的自我修养”。他强调个人的道德修养是社会秩序和良政的基础。⁴

在中国，“人的素质”这一说法时常在讨论中出现。缺乏素质往往被归结为问题的根源和发展的障碍。

“自然而和谐”是宇宙的根本特性，亦是人不懈追求的理想状态。然而，裙带关系、自私自利、国家冲突、家庭内部和男女之间的摩擦、宗教间的隔阂，都在人类和谐、进步与团结之道上作梗。因而，要消弭争论，抛却好恶而改进人品就势在必行了。

但这一目的不能靠惩罚来实现，因为惩罚只能矫正外部的，却不能疗治心里的。此即儒家学派思想何以主张，要让民众行止端正、品性高尚，教育乃是关键而有效的途径，因为人性之本质是与天道相合的。⁵

阿博都巴哈用类似的语汇描述了个人的灵性化，精神的成熟可作为矫正犯罪的方法，以及社会和谐的基础。

精神文明会训练每位社会成员，除了可以忽略的少数外，无人会从事犯罪行径。人们会把犯罪看成是奇耻大辱，把罪行本身视为最严厉的惩罚。⁶

之所以确信道德教育能够成功，乃是根据这一假设：人是可以教化的；人有别于动物，是“天”的反映，有组织社团的才智，生来就有爱与正义的能力。荀子说：

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荀子·王制》）

确信道德教育能够成功，还须基于这一假设：人究其本性，并非不可救药地自私而有侵略性。这后一种行为，其产生乃是后天学得的，而非先天所固有。

尤为特别的是，对物质追求的美化——它既是所有这些观念形态的起源，同时又是其共同特征——正是在这里，我们找到了“人的自私和侵略性无可救药”这一谬论滋长的根源。正是在这里，必须为建设一个适合我们子孙后代的新世界清理场地。⁷

³ Letter from the Universal House of Justice. The Wisdom of Confucius, Edited by Lin Yu Tang, The Modern Library, New York, 1938, p.22.

⁴ John K. Fairbank, China: A New History, Belknap Press, Harvard University, Cambridge, London, 1992, p.124.

⁵ Sun Libo, Unpublished paper, 1998.

⁶ Abdu'l-Bahá, Selections from the Writings of Abdu'l-Bahá, p.133.

⁷ To the People's of the World: A Bahá'í Statement on Peace, The Universal House of Justice, 1985.

孟子也赞同，人性并非是恶的。他把人的精神比作山上的树，山被附近乡民垦伐，被牲畜侵蚀。他问，山貌退化是否归因于山的本性？他说：

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蘖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见其濯濯也，以为未尝有材焉，此岂山之性也哉？虽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犹斧斤之于木也，且且而伐之，可以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气，其好恶与人相近也者几希，则其旦昼之所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则其夜气不足以存；夜气不足以存，则其违禽兽不远矣。人见其禽兽也，而以为未尝有才焉者，是岂人之情也哉？（《孟子·告子上》）

千年来中国人一直明白，对个人的道德教育和训练是发展的基础。在全世界人民和各国奋力建设一个全球共同体时，其重要性再次显现。

随着教育的改善以及知识的迅速传播，我们每个人的能力获得了快速的提升。相应的“参与和要求进步”的能力的增长需要一个新的环境，以便每一个社会成员的未知的潜能都能够被拓展，而新的社会和管理形式能够安全地导引这股新兴的能量。

随着社会模式更加具有整合性，我们需要身边有个地方，在那里我们可以表达和体验创造力、责任感以及携手合作。

（二）社团生活的成熟

在社会组织中有一个层面大于家庭而小于城市，我们称之为“社团”或“社区”。我们在村庄、街区和单位里能够体验到社团生活的一些方面。因为世界大多数地区是从权威式社会结构转变过来的，这些初级的社团是由村里的头面人物、有权势的人或者指定的人所领导的。朋友的圈子、共同利益集群、校友会、网友组织等都有一些社团的特征，但是没有实际的存在地点。

所有上述提到的组织都曾经或者仍然正在增进人类的成长和进步。

社会发展由于从多方面吸取营养变得更加负责，高层次的社会单位如城市、国家和全球需要更广泛的草根阶层的参与。

根据上面的这些现状，我们可以将社团重新定义为一个由个人、家庭和各类组织自发形成的团体，这个团体会创办各种机构和活动，其目标是大家一起为圈内和圈外的人提供服务以综合地改善生活质量。

中国习惯于群体意识，常常会说“集体”。其渊源在佛教进入中国之前，但这一观念由于大乘佛教强调通过救度众生来救度个人，而得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中国的集体感与和平倾向是构建社团的宝贵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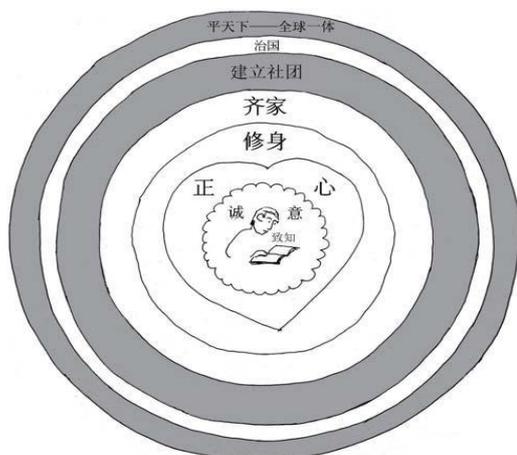


图2 社会与个人的关系

集体感针对的通常是家庭、朋友和全体中国人。目前的社会结构从较大的范围，如族群、国家和城市，一下子跳到了工作场所、家庭和个人这些较小的范围上。工作单位一度也是某种社团，但这一机制正在消失。城市、区政府、街道委员会等等更多的是行政机构。还有一些小型社团，但仅限于老同学、同事以及家庭的圈子。

1935年，林语堂（1895~1976）在他的《吾国与吾民》一书中指出，儒家教义《大学》贯穿了各层次的社会组织，唯独漏了社团。从国家到家庭的跳跃即可为证。团结和忠诚在这两个层次上还能发挥作用，但在中间层次上意义就弱了。

也许在过去，这些社会结构已经足够。孔子应该也会同意在社会的阶梯上再增加“社团生活”一环，因为当代社会和个人已经成熟了。

中国开放以来最明显的特征之一就是个人能力的增强，不论男女。随着中国超越了专制型社会结构而趋向成熟，亿万民众在自行决定如何将其能量和天赋疏导出来。人们自择教育和职业、创业，国内国外哪里有工作机会就去哪里。专业的服务态度开始取代家长作风。一个巨大的能量库正在形成，只待引流。

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一个社会和管理机制来导引这股不断增强的个人潜能，城市就会变得更有效率，城市生活也会极大改善。目前这种在家庭和朋友圈子外隐匿身名的状况，越来越多的城市区域被高墙和保安隔离开来，反映了对陌生人的恐惧，也是缺乏社区的结果。我们需要离家较近的机构和外围来提供相互的支持与合作，就像家庭内或朋友的圈子内的相互支持和相互关系带来利益和安全感。同样，在一个友好的、管理完善的社团层面扩展相互支持和相互关系的界限，将更大的拓展利益和安全感的范围。

对我来说，发展规划和策略的一个主要挑战便是，怎样创建一个全球化社会的机构群，一个将社会各个阶层联结在一起、它们之间也能够互相联系的结构网络，使之逐渐成为全球所有居民都能够方便使用的共同财产。否则，我担心，全球化对大多数人来说恐将沦为边缘化的同义词。⁸

社团层面的接触有很多怀疑和提防。即便是好人也会迟疑。隔绝和匿名的渴望主要来源于害怕陌生人会提出无边的、不可控的要求；一旦你开始帮助某人，也许就再也无法中止他对你的要求。

这种恐惧是有道理的；在居民小区这个层面没有相关的管理机构来应对这种情况。如果没有相关机构的发展以及社会质量和技巧的成熟，此类社团的延伸就不可能出现。信息的分享、需要和服务间的对接、信任的扩展，都需要在社团层面有新的组织形式和领导力。

如果参与社会真正是生活的一部分，则城市的孩子可以参与社区服务，成为学校课程的重要部分。让他们更亲密、更实际地敞开心扉面对周围的社会，能开阔他们目前的“学习——家庭作业——电脑游戏”的活动范围。

这反过来又会给他们的学习带来更明确的目的感。孩子们更容易想象如何把他们所学的应用到周围世界的需要上。对这种社会教育多加重视，还会让孩子有更多的兄弟姐妹，减少独生子女家庭的问题。在服务中成长，这样的氛围也会减少自我中心感。

青年能为社团的建设作出宝贵的贡献。目前，在中国，青年人的大部分时间都是为了在强调分数的学习中取得好成绩。这很容易把他们与生活隔绝开，限制了他们的社会性成长。如果社团服务能够被认可，青年人可以参与到诸如低龄人的教育中，他们也会力行真正的服务，负起某种程度的责任——其实他们已经为这种责任做好了准备，只是从未付诸实践。如

⁸ Farzam Arabab: Promoting a Discourse on Science ,Religion and Development , in Sharon ·M.P.Harper(ed.) *The Lab, the Temple & the Market: Reflections at the Intersection of Science, Religion and Development* , Canada's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re , 2001.

果教育体系包括参与社团建设，一些人力资源亦可从较强的学校向较弱的学校流动。这就将与现在这种过分强调学科分数而分裂各学校的状况有一个鲜明的对比。学校间互不交流，反而是根据各校考入大学的人数排名、造成学校间的竞争。参与社团工作还会给予青年人以机会，不靠约会来了解异性。当你看到一个人怎样工作，怎样与他人互动，怎样行使责任等等，你会更了解他。

在基层社会里，创造和参加社团活动不仅给人们提供了服务与接受服务的机会，更会大大增强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了解。人们会通过丰富活泼的社团活动，发现他们当中富有领导才能的人，从而使日后的社会选举更为深入和更有成效。

中国的“集体”意识与和平的处世态度将是社团建设的宝贵基石。信任的圈子需要扩大。一个成熟的信仰体系的标志就是它能够有助于创建成功的社团生活。

目前为止，我们还是在固定的范围内讨论社团问题。在今天互联网与交通迅速发展的时代，不同地方的社团可以有很多新的渠道相互交流。而社团给人们带来的收益则逾越了地理范畴，从同一城市到世界任一城市。

从始于1844年的电报开始，城市迅速地成为遍布全球的网络连结点。构成现代城市的主要技术因素出现于1877至1889的十二年间。通过这些发明，城市得以朝着水平和垂直方向扩展；城市的工作、娱乐和家庭生活时间能够轻易地延长到夜晚；人们在城市里或城市间的相互接触也大为快捷简便。

蒸汽机	1781
铁路	1800
电报	1844
电话	1877
白炽灯	1880
摩天楼	1880
有轨电车	1885
地铁	1886
汽车	1889
电梯	1889
无线电通讯	1901
飞行器	1908
电视	1920
计算机	1930
互联网	1980

图3 各种发明的时间

尤其是随着国际电讯的普及，城市有了新的维度和目的，城市正变成整个星球网络的一部分。它们正在成为全球化文明的基础设施。城市及其内部的社团成为所有人据此获取世界资源的基础，同时为建立一个全球社会努力。从理论上讲，城市越是发挥这种功能，城市的潜力就越能得到开掘和提升。

(三) 两性关系的成熟

世界过去一直由武力所统治，男人因身体和心智的品质更为强悍好斗，而凌驾于女人之上。但天平在移动，武力正失去份量，而女人所擅长的心智的机敏、直觉、爱与服务的灵性品质，正获得优势。因而，新的时代将是少些男性气质，而更充满了女性理想的时代，或者

更确切地说，是男性与女性的文明要素更为均衡的时代。⁹

只要专制型主导大局，妇女，就像少数群体一样，不得不去更了解男人，而胜过了男人对女人的了解。男人公然或无意间表露的专制的、传统的态度，会让女人受挫。对于中国妇女的高自杀率，这会有几解释。¹⁰

妇女正在幕后等待，比其他人更迫切地要求得到更好的机会来施展其潜能。中国有许多非常成熟精干的单身妇女，她们似乎不大可能找到好丈夫，尽管男人的数目比妇女多。许多妇女嫁人好像是甘心要默默无闻地做丈夫的教育者。

这种不幸部分原因在于，妇女更多地认同人类生存的性质基本上是合作的。男人还处于专制型的时候，妇女已经展示出整合型的某些特征了。

女人的确更有一种精妙的才能，可涵容他人的需要且轻而易举。我的意思是说，女人较男人更善于首先看出他人的需要，而后又深信能满足他人的需要——这让女人既能回应他人的需要，又不会觉得有损她们的身份。¹¹

为家庭生活和子女教育肩负的责任，使得妇女作好了准备，来为人类的进步做出关键的贡献；她们更为推动当今世界专制型的社会向整合型过渡而装备起来。建设更加亲密的社团生活这一需求，将为自我发展同时服务他人提供更多机会。妇女很有可能成为这一事业的领导者。

传统的经济模型中，世界被看成是一个充满了以自我为中心的独立的消费者，这已过时了。新的模型会将环境因素和社会因素综合考虑。群体的利益、家庭与社团的重要性都应在经济活动中兼顾到。而在这些方面妇女的经验恰恰可以有出色贡献。¹²

在我们成熟的新阶段，女童教育具有新的重要性。合作与服务的态度，由母亲传给下一代更容易；古人说，“教男教一个，教女教一家。”¹³ 如果财力短乏而不得不做取舍的话，女孩应比男孩更有优先权受教育。即使纯粹从经济的观点出发，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也说，为培训下一代而培训妇女“……和世界上任何其他投资相比，很可能获得更高的回报率……”。打破贫困循环最有效的方式是投资女童教育。在低收入国家，让女童和男童一样接受中等教育所需费用，还不到这些国家国防经费的10%。低收入国家的父母不在女儿身上投资，因为他们没有指望女儿能为家庭做出经济上的贡献。”在中国农村，女儿会离开娘家住到夫家。短期内女孩不像男孩那样宝贵——于是女孩要留在家里做家务，让她的兄弟上学——这一预言就自圆其说了，却让妇女陷入了被忽视的恶性循环中。另一方面，受过教育的母亲更有能力出去赚钱，会有完全不同的选择。她很有可能少生孩子，但她能让孩子更健康，注重每个孩子的发展，保证女儿有公平的机会。女儿的教育又使得女儿的女儿更有可能和男童一样受到教育而且健康。恶性循环就这样变成了良性循环。¹⁴

妇女解放、两性平等的实现，是和平最重要的先决条件之一，虽然对此少有公认。如果“中国在物质、文化和精神资源和潜力方面列居各国之首”，如果妇女在迈向服务与整合型人际关系范例时作出表率，则整个世界都应注目中国妇女——首中之首！

⁹ J.E.Esslemont , *Bahá'u'lláh and the New Era* , 1976 U.S. edition , p.156.

¹⁰ 在北京，1991年的一天早上，我离开在宣武门的家，看见人行道上有具盖着塑料布的女尸，手伸在外面。她是从12楼跳下来的。人们说因为她生了女孩，而家人要的是男孩。

¹¹ Dr. Jean Baker-Miller , *Towards a New Psychology of Women* , Beacon Press , Boston , 2nd edition , pp.62-3.

¹² Dr. Jean Baker-Miller , *Towards a New Psychology of Women* , Beacon Press , Boston , Second Edition , p.62-3.

¹³ Agnes Jung , *Unveiling India, A Woman's Journey* , 1987 , p.92.

¹⁴ Lawrence Summers , Chief Economist , World Bank. Essay for *Scientific American* , The Most Influential Investment , August 1992.

(四) 与权威关系的成熟

随着人类的成熟发展，大众与领导者之间的关系也在发展。我们需要逐渐摆脱以权威崇拜为导向的社会体系，走向以合作、承担社会责任为特征的成长型社会体系。从历史角度看，中国与西方存在于两种完全不同的体系中：西方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体系和中国以中央集权为基础的体系。长期以来按照西方的观点，中国和“东方社会主义阵营”迟早都要向西方的“民主方向”发展。但从过去三十年的历史看，中国人运用东方的哲学理念，平稳地完成了经济体制的改革，保持了社会的基本稳定。现任政府更是直接提出建立“和谐社会”的目标，尽力化解各种社会冲突。这使我们看到，基于不同的历史发展轨迹，东西方在未来有可能做到殊途同归。

在此，我们仅从个人自由和党派制的角度探讨这个问题。首先，自由的质量与个人的知识和训练有关，中国人很明白这一点，常常不用岁数识别一个人的年纪，而是看一个人和自由的关系有多成熟。

三十来岁称为“而立”之年——稳固的发展阶段；四十来岁称为“不惑”之年；五十来岁则“知天命”——明白命运的意义；六十来岁“耳顺”，能明辨优劣；七十来岁，“从心所欲”却不逾越规矩。人们懂得真正的自由是经过毕生的学习后达到的。自由有界限，它不应“逾矩”。

这种对自由的理解使中国人具有冷静应对生活中的矛盾冲突的能力。尽管当今中国的年轻一代非常崇尚“自由”，但根深蒂固的克己理念使他们对很多其他国家，尤其是和宗教组织成员有牵连的国家所发生的自我毁灭的暴力冲突大惑不解。同时也对美国允许个人携带枪支的法律很惊讶。

比如，中国大多数城市人遵守一个子女的法律，因为他们认为需要这种严厉的措施来预防人口过多的后果。有谁感谢过中国的克己，中国控制了世界人口的数量。如果你在中国的城市的高峰时段挤过公共汽车，就会亲身体会到人们为什么能够理解计划生育政策的逻辑。尽管有棘手的副作用，即一个子女的政策会助长溺爱孩童，会减少照顾年迈父母的子女，但中国依然坚持不懈。缺少社会福利体系，要在农村生存是很艰难的。生活要靠养儿子，因为儿子将来会留在家里。这一需求和一个子女的政策相冲突，导致了女胎的流产。这个问题还会持续，直到教育水平提高了，以及有更多的退休金规划就位。

中国人的克己遏制了那种导致社会混乱的颠覆行为，这种克己并非只是畏惧外部威吓。中国人把领导者看作是由“水”即人民所支撑的船。人们懂得水的目的应该是载舟，而非覆舟。

西方往往不把这种做法看作维护自由之举，却认为这种做法缺乏自由。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认为中国的这些传统更符合人类走向成熟的方向。中国的克己文化在当今金融危机中，比无限消费的西方文化显得更“可持续”些。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中国数千年形成的以封建家长、长官意志为主宰的文化已经消亡，实际上，中国通向理想社会的道路还很长。

其次，关于党派制。在成熟的社会中，我们将从一种充满对立意识的体制转换到另一种和谐统一的体制。在新的体制中，取代对立竞争、自我利益最大化的是通过公众参与，磋商调和，达到团体利益最大化。正如一对争吵不休的父母不能管好一个家庭，一个成熟的社会不可能由一个时时处于对立争斗的政府机构管理。

西方对民主的定义通常是民选政府、多党制和对政府行为无限制地加以批评的自由。多党制出现于以权利追逐为目的的不成熟社会体系中。这种带有相互监督制约的体系在防止滥用权力时是有必要的。但当我们的重点转移到建立以公正和团结统一为原则的新体系时，这种以对抗为基础的政府机制就该淘汰了。

对中国人来说，千百年来适应的是一个不可分裂的权力中心。政治体制中的“在野党”或“反对党”的概念与其传统道德和知识系统相矛盾。多党制对中国不单是一种外来的概念，而且可能引起国家分裂、甚至内战，造成适得其反的效果。在中国向成熟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没有必要重复西方的对抗性多党制过程。中国应该沿着自己的传统道路，扩大和改进目前的各级人民代表的选举，强化民众参与和磋商的过程，使之更具有民选的意义。

(五) 决策的成熟

巴哈欧拉倡导的“磋商”程序，是重新构思所有人际关系的中心。巴哈欧拉的忠告是：“凡事须磋商。……天赋理解力通过磋商才能成熟起来。”

在追求真理方面，“磋商”所要求的标准，远远超越现在商议时经常采用的谈判与妥协。现今社会上盛行的“抗议文化”，不但不能成功地追求到真理，反而是严重的障碍。磋商的目的是使大家在任何事情上都能对个中真理达成一致，并在任何时刻选择最明智的行动。辩论、宣传、抗衡方法及派别组织等长久以来常常被使用的集体行动方法，都是有损这一目标的。

巴哈欧拉提倡的磋商过程要求参与者把自己视为整体的一员，将全体的利益和目标放在个人的观点之上。大家在坦率、礼貌的气氛下讨论。各方所提出的意见并不属于个人而是归于集体所有，任由集体来决议取舍或改善，谋求能最完善地达到目的。磋商成功的大小，是看在什么过程上，参与者不论本身在磋商时最初有怎样的意见，都支持全体的最后决定。在这种条件下，一旦发现一项决议在实践中有缺点，就容易重新考虑。

如此来看，磋商是在人类社会事务中履行正义的具体表现。磋商是集体努力成功的关键，因此是所有可行的社经策略不能缺少的基本部分。诚然，只有在每项社经计划上以磋商作为策划原则，民众的参与才能有成效；而社经策略的成功则取决于参与者的投入与努力程度。巴哈欧拉的明训是：“只有履行正义，人才能达到其真正的地位。只有通过团结，才能拥有力量。只有经由磋商，才能获得福利与幸福。”¹⁵

二 中国对人类成熟的贡献

人类正面临着一个巨大工程——建立和平的世界。我们正在寻找“一个促进全球繁荣的发展范例”，而那需要“考虑个人和社会的精神和物质特征，应对这个地球上人民和国家间不断增长的相互联系”。¹⁶

中国会贡献什么？

1990年，著名的汉学家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费正清（John Fairbank）在《中国：新的历史》的导言中，称中国为现代性的后来者。他问道：中国从隔绝状态中浮现出来，只是及时地参与世界的终结，还是借其数千载的生存经验以援救世界？

1923年，作家兼国际事务观察家守基·阿芬第说：中国，这片土地有其自己的世界与文明，其人口占全球的四分之一（1923年），其在物质、文化、精神资源与潜力方面列居各国之首，其未来无疑是光明的。¹⁷

1921年，伯特兰·罗素在北京大学演讲时，评论中国道：“生产而不占有，行动而不独断，发展而不主宰。”¹⁸

¹⁵ 巴哈伊国际社团：《人类的繁荣》，收录于《谁在书写我们的未来——巴哈伊全球愿景》，澳门：新纪元国际出版社，2009，第39页。

¹⁶ Bahá'í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ward a Development Paradigm for 21st Century*, August, 1994.

¹⁷ Letter from Shoghi Effendi to the Bahá'ís of the East, 23 January 1923.

¹⁸ Russell, Bertrand, *The Basic Writings of Bertrand Russell: 1903-1959*, Edited by Robert E. Egner and Lester E. Den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Ltd, 1961.

1917年，阿博都巴哈（巴哈伊教创始人巴哈欧拉的儿子）说：

中国拥有巨大的潜能。中国人极好追求真理且纯真无邪。……真的我说，中国人免除了任何欺诈伪善，可为理想的动机所激励。中国是未来的国家。¹⁹

这些对中国寄予高度期望的说法并没有聚焦在中国的商务能力或辛勤工作的能力上，也没有强调中国在14世纪前科学技术成就领先于世界文明的辉煌时代。相反，他们主要提及中国人的品质、社会和精神能量与潜力。这就是中国的潜在贡献吗？

……在过去的四十个世纪里，中国在生活之道上必定汲取了许多教训，其思想必定已臻成熟。或许中国要有所贡献。比起相互杀伐，肯定会有更好的方式、更人道的方式处理国际争端。肯定的，有着四亿民众（1930年）、四千年文化和广阔的资源，中国必将对人类的和平与进步有所贡献。²⁰

如果我们对中国的精神——哲学遗产做一个简要的调查，会发现中国的精神有道家、儒家和佛家的印记。例如，中国由道家衍生出融合正反和化解矛盾的能力——更多地看到系统整体而非二元分立的能力；由儒家学习了如何把精神贯彻到日常生活中；从佛教获取了高洁的灵性，敏锐感知到物质和灵性之间的契合。

个人对真理实情的调查，乃是内外平衡的支点。“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中国人的团结意识和社会责任感，至少部分可以追溯到大乘佛教的教义：

……普度乃基于众生本为一体之念。……个人可净化自己，从而逃离罪业之苦，然只要还有人尚未觉知全体的灵性交流，则任何人的救度皆非尽善。……度人以度己乃佛教所教诲的普世之爱的训示。²¹

如要寻找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支撑，我们将发现中国提倡的和谐、关系的重要、平衡、中庸以及集体重于个人的信念等等都给予我们很好的启发。与无限制的扩张、满足欲望、获取、消费主义以及个人重于集体等相比，这些不是更吸引人吗？中国艺术的美、诗歌、园林，都体现出人与自然的可持续性与和谐的诸多考虑之一。

迅速审视了中国的社会——哲学——精神遗产后，我们开始明白为什么对中国的“资源”与“潜力”的评价如此之高。在中国的精神基因库里，我们发现了很多活跃和潜藏的因素，都与人类进展到其综合成熟期相关。

中国人第一个会承认他们并没有总是遵循传统的价值观和教诲。他们指出历史上的暴乱、当下的问题，如腐败、社会问题、环境恶化以及贫富差距不断拉大。

当我们回顾中国历史上的暴乱时，应将其放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在几千年前开始的伟大文明在唐宋时期臻于成熟，随后是长期的没落，直至1911年。暴乱标志着每一个朝代的兴替，两次领土扩张时期，以及革命和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内战，中国漫长的历史上稳定增长期与分裂混战期相交替。我们需要注意主要的征服与扩张期发生在元朝与清朝，当时统治中国的不是汉族而是少数民族。蒙古人（元朝1268-1368年）和满族人（清朝1644-1912年）均来自北方，他们分别占领中原，执掌中国航船之舵。还需要注意的是，在更近的历史时期，中国不曾参与全球殖民统治，却曾受到他国的殖民统治。

尽管战乱频仍，中国在最长的历史时间养活了最多的人口。因此，我们应该将那些不时

¹⁹ Abdu'l-Bahá, Reported in *Star of the West*, vol. 8, April 28, 1917, No.3, p.37.

²⁰ James Yen, *Intellectual Shock of China*, *Star of the West*, 19, Mass Education Movement in China, SW October 1925, 16:7.

²¹ E. A. Burt, *The Teachings of the Compassionate Buddha*, A Mentor Book. 1955, p.124.

出现的战乱期视为文明建设之漫漫长路上的困难——或者说是当时缺少更恰当的方式或方向，而不应将它们视为中国人的天性。

同样，中国当前所遭遇的社会和环境问题，以及逐渐增强的“财富不能带来快乐”的不安，都表明了与其道德标准间的矛盾，与其精神根源的距离。这种不安同时表明了中国人心理上的价值系统的活跃程度，仍像飞轮一样转个不停。诗圣杜甫的声音仍在回响：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²²

如果我们将这些缺点看作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程中尚不成熟的阶段的标志”，那么极有可能的是，尽管中国的精神遗产目前看来极为贫弱或受到了强大的威胁，但并没有失落。能认识到这些缺点已经是成熟的标志之一。

通过一个世纪的追问、探索、实验以及汲取教训，形成了物质与精神必须携手发展的认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贫穷和物质匮乏的时代，首要的任务是集中精力改善物质条件，传统的和革命的美德，诸如克己、适度、为人民服务、中庸、服从等等很少有冲突。中国在“废除长期的不公正和独裁统治方面，为地球上五分之一的人口解除极度贫困方面，以及扫除基于迷信基础上的根源极深的信仰体系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进展。²³

1978年改革开放既鼓励了外国人又激发了国人的主动性，以参与国家（首先是经济和科学）的重建。中国现在正不断力争现代化以“赶上西方”，一举一动都透露出变迁或“改革”。中国对其现代身份的探究，并未循行偏狭的民族主义道路；相反，中国自由地尝试非中国式的科学、技术、商业方法、法律等等。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从封闭到有意识地与外部世界往来。为了“追上西方”，中国正经历“改革”和现代化的挣扎。从消除绝对贫困到改革开放，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亚洲新兴的经济力量。短短30年，中国已进入经济飞速发展的轨道，世界也随之体验了她的改革开放，并且为它的发展而投资。

今日中国摒弃了数世纪以来漠视科学的态度，而给予科学崇高的地位。²⁴ 科学和高科技现在被视为经济发展的表征和主要方案。中国近来增加了对研究的投资，正摩拳擦掌要成为科学领域中的世界领袖。

可以明显地看到，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正在走向成熟的道路上迅猛前进，她的能力得到了极大的解放。中国有意识地奋力前行了一百年。中国没有自满，也没有松懈麻痹。加入WTO，成功申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均有助于再度唤起对中国前途的信心和乐观精神。

然而，最近几年，伴随着成功，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出现了阴影。腐败、社会和环境问题持续不断，精神状态萎靡不振的标志越来越明显。腐败在一个将领导工作与道德水准相联系的文化背景中更显突出。与个人自私自利的行为相比，对腐败的容忍可能是对稳定更大的威胁。

现在已经实现了相对的富裕，对少数人先富起来的现象也能够接受，人们不知道除了过舒适的生活外该如何处理这些财富。不同的价值观互相矛盾地混在一起。中国传统中平衡个人和集体权利的习惯导致了中国人对现代社会里为追求物质财富而追求财富的倾向保持着一种深刻的怀疑和警惕。人们逐渐认识到金钱并不能带来快乐，认识到缺少“社会生态”和物质与精神的一致性。中国亲身体会到，物质的高度丰富、技术与科学的发展都不是最终的目的，也不能确保“和谐社会”。

²² Du Fu quoted in *The White Pony*, an Anthology of Chinese Poetry, Edited by Robert Payne, Mentor Books, 1960, p.183.

²³ *Thoughts on China*, article by Dr. Farzam Arbab, May 19, 1989.

²⁴ 参见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汇编的《古代中国的技术与科学》，外文出版社，1983，第1页。

在向西方开放的近些年,中国的精神资源被西方世界消费导向的物质主义发展模式所遮蔽的现象日益严峻。中国越是接受去掉了我们精神能力的发展的“现代化”的定义,就越不能看清自己潜在的精神贡献的价值。她对自身卓越理念的鉴识,不仅因为强调物质发展而被抑制,而且因她自谦的本性而被延缓。“的确,我们国家落后”,很多中国人会点头称是,却加强了西方的自我优越感。

科学的进步,尽管导致了物质的发展,却需要与道德进行对话,以公正、恰当地发挥它的功用。科学技术既可用于和平,也可以在腐败、冷酷或者不明智的人手里被用于破坏性的目的。例如,全人类所痛心疾首的大量核武器、化学武器等等的过度储备,显然是对科学的误用。而在虽不致命,但其危害性更为隐秘模糊的前沿领域我们遭遇到新时代的网络盗窃和恶意病毒。

1939年,朱丽叶·布莱登 (Juliet Bredon) 说:

虽然所有这些现代的进步尤可钦佩并引人注目,但对于中国来说,北京未来的一大问题,是要让新的标准适应中国人的心理。过渡时期常常带来错误和仓促的现代化冒险,而令一切都丧失了个性。在陈旧和崭新的两极之间,钟摆来回往复。要加快运动又不扰乱平衡,是有思想的中国人已开始着手的一项艰难而精巧的任务,他们确信无疑:要么道德伦理和(科学)知识并驾齐驱,要么丧失一切。²⁵

中国发展道路上的阴影是对精神质量的一个警示,提醒人们平衡内在和外在的发展。现在已经消除了绝对贫困,已经到了将注意力返回到根源的时候了,即“修身”,改善道德价值和行为。

从历史上看,中国人极其明了失去稳定的代价。他们已获得了有意识地谋划透过苦难成就未来的能力。苦难有积极的正面价值,它首先是一种能力资源。中国典籍高度评价这一过程,如《易经》。另外,孟子有这样的描述: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²⁶

而近年来,物质与精神的失衡所带来的痛苦与尴尬将挑战中国对更重要的社会问题的深入探索。

但是如果将我们时代的真正需求与中国传统里的精萃成果相比较,我们就会发现中国人承载的许多品质、技巧、态度和能力,正是挣扎着迈向成熟时期并抛掉“积重难返的冲突格局”的世界所需要的。中国浩繁广博的文化、哲学和精神遗产与新时代的需求多有合拍之处,发现中国能为人类“真正”的现代化作出宝贵的贡献,这会是一个确认,一份欢欣,振奋着中国人的心灵。也许,如费正清所推论的那样,中国的天命不仅是在自己的国家实现物质与精神更有活力的平衡,而且还要与世界分享其经验。

随着中国越来越多地与他国交往,它可以通过自身的范例及其促进世界和平的协同努力,成为更具效率的新世界文明的参与者。中国不需循行他国踩过的旧径;它可以开辟新路,直接迈向新世界秩序中一个享有尊荣的位置,而中国将亲身协助该秩序的建设。²⁷

²⁵ Juliet Bredon, Peking, pp.54-5, 1931.

²⁶ Mencius, Legge, bk.6, pt.2, ch.15, art.2.

²⁷ Thoughts on China, article by Dr. Farzam Arbab, May 19, 1989.